

天方奇毯——伊斯兰与世界文明的交织

展览展示来自萨法维伊朗、鄂图曼土耳其和莫卧儿印度一带的地毯，以及10至19世纪的陶瓷、金属器物、手稿和玉器。这些精美的器物展现了近代早期三大伊斯兰王朝——萨法维（1501-1736年）、莫卧儿（1526-1857年）和鄂图曼（1299-1923年）王朝之间因贸易、人口迁徙和外交活动而兴盛的文化艺术交流。展览亦呈现了中国与伊斯兰世界艺术互为对方灵感之来源。

展览分为四个单元：第一单元介绍7世纪以来伊斯兰世界与中国的文化交流与互鉴。其后各单元分别聚焦于萨法维王朝、莫卧儿王朝和鄂图曼王朝，探讨每个王朝的地毯和其他艺术品的设计和创作，并深入介绍皇家地毯和细结地毯的文化意义、跨区域知识传播，以及本地特色。

展览由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与多哈伊斯兰艺术博物馆联合主办。百余件展品主要来自卡塔尔多哈伊斯兰艺术博物馆的重要馆藏，亦有故宫博物院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珍藏。

关于多哈伊斯兰艺术博物馆

伊斯兰艺术博物馆收藏了世界闻名的伊斯兰艺术文物。博物馆于2008年向公众开放，十八个翻新的常设展览展示了横跨十四个世纪的伊斯兰历史珍宝。其藏品来源广泛，从非洲马格里布远至中国和东南亚。其中包括带精美图绘的《古兰经》、彩绘手稿、庄严华丽的地毯以及工艺精湛的陶瓷、玻璃器和金属器。博物馆由建筑师贝聿铭设计，外观简洁却气势恢宏——它不只是一座博物馆，而是一座多哈天际线的标志性建筑。

第一单元 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文化交流

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交流可以追溯到唐朝(618-907年),史学家杜佑(735-812年)编纂的《通典》中,曾提及伊斯兰教创立人先知穆罕默德(约570-632年)。7世纪中期,连接波斯湾和中国海域的海上网络已开始发展,穆斯林商人在中国沿海的海南岛、泉州、广州、扬州,以及内陆的四川等地建立了贸易站,他们的海上贸易活动对中国南方的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中国与外国之间运送货物的商船有时会遭遇海难。沉船遗址发现的中国陶瓷和伊斯兰玻璃,标志着远隔重洋的古人之间的连结。从阿拔斯王朝(750-1258年)到鄂图曼王朝(1299-1923年),中国陶瓷和其他珍贵物品都让伊斯兰世界着迷。中国艺术中的图案和纹饰,如云、莲花、龙等,都是伊斯兰绘画、陶瓷和地毯等艺术品中重要的纹饰。

中国艺术家和工匠也从伊斯兰世界的金属器、玻璃器和纺织品中获得灵感。伊朗卡尚地区的钴矿为中国陶工提供了唐代以来制作青花瓷的重要釉料。明代(1368-1644年)时,马欢着《瀛涯胜览》记载了与他同为穆斯林的中国航海家郑和(1371-1433年)曾七次率领舰队远航波斯湾,以及更遥远的地域。不少明代陶瓷的造型、纹饰、色彩都受到伊斯兰艺术的启发,是中国与伊斯兰世界深厚连结的明证。

地毯的制作

本次展览展出的地毯为绒毯，皆使用“打结栽绒头”技术编织而成。它们柔软而耐用，富装饰性而实用，让织工有无限创作空间。地毯是伊斯兰世界具有标志性的艺术形式，现存最早绒毯之历史可以追溯到2,300多年前，可能源自古波斯或亚美尼亚，但其确切产地还有待研究。

绒毯的基本组织结构由垂直的经线和水平的纬线构成，在织机上织成，之后，织工在经线上不断打结，形成绒头和地毯的纹饰。结的密度是衡量地毯质量的关键指针之一，一些品质最上乘的绒毯每平方分米（10x10厘米）要拴成千上万个结。织工会依照设计图制作地毯。打结的布局依照的是伊斯兰世界的口述传统，主管会为织工背诵或吟唱出一组指令，例如“在第三排的六个蓝色结旁边打两个红色结”。展览中体积最大的数块皇家地毯，每块需要十多名织工用数年时间才能完成。此次展出的地毯，经线和纬线为丝线、羊毛线或棉线。表面的“绒头”为丝或羊毛质，最优质的羊毛是喜马拉雅山羊绒。织工有时会用包金或银的丝线，达到更美观的效果。

15世纪末，在伊斯兰世界，织工用的线更为精细，结的密度也随之增加，让他们能织出更细致的图案。此处的展品为历史上最强大的三个伊斯兰王朝——萨法维王朝、莫卧儿王朝和鄂图曼王朝而制作，这些极其精美的大型地毯彰显了王朝的权力，用于宏伟的宫殿和隆重的宫廷仪式之中。

“一带一路”的历史根源

中国长久以来就与西域有文化交流。汉武帝(公元前141-公元前87年在位)派遣张骞(卒于公元前114年)西征,与游牧部落结盟,并寻找传说中的“天马”,以增强中国骑兵的力量。尽管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都有商人往返于中国的西部地区,张骞的深入报告仍让汉朝对西域有新的了解。

5至6世纪,中国与波斯官员的交往愈加频繁。萨珊王朝(224-651年)的波斯使团先后来到北魏、南凉和西魏宫廷。隋炀帝(604-618年在位)统治期间,中国使者也拜访了萨珊王朝统治者库萨和二世(又称霍斯劳二世,590年、591-628年在位)。萨珊王朝灭亡后,唐朝(618-907年)朝廷甚至为王子卑路斯三世(636-679年)提供了避难的宫殿。

在新疆、河南、陕西以至广东等地,考古发掘了大量萨珊银币。这些钱币的年代可追溯到萨珊王朝十二位统治者在位时期,印证了中国和伊朗之间活跃的海陆贸易。“丝绸之路”作为重要的贸易网络,正是以丝绸这种最贵重商品而得名。其他类型的纺织品,以及纸张、茶叶、香料、矿物、金属和玻璃,都非常畅销。

粟特位于现今的乌兹别克和塔吉克,当地居民也属于波斯族,积极参与丝路贸易。粟特商人足智多谋、坚韧不拔,精通多种语言,并将外国的商品、时尚、艺术和文化带到中国,所到之处,让当地人着迷。粟特人体现了沟通合作、开放包容、互鉴共赢的丝路精神。

秉承着同样的精神,伊斯兰世界的商人们漂洋过海,来到东南亚、印度和中国。他们带来象牙、玛瑙、珍珠、胡椒、玫瑰水、乳香和纺织品,以及其他货物和古董。10至13世纪,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海上贸易达致新高峰,许多穆斯林商人在中国沿海地区定居。宋代(960-1279年)朝廷颇为珍视这些远方来朋。当时建立的友谊,至今日久弥新。

伊斯兰世界的艺术

伊斯兰教是以向先知穆罕默德（约570–632年）降示的《古兰经》神圣教导为基础的宗教。穆斯林面向位于现今沙特阿拉伯的圣城麦加每天礼拜五次，亦会前往麦加朝觐。乐善好施是伊斯兰教的核心教导之一。伊斯兰历九月的斋戒，提醒穆斯林反思生活中的恩赐和帮助有需要的人。

现时，穆斯林占全球人口约25%。伊斯兰世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仅包括阿拉伯半岛，更涵盖西班牙南部和北非一带，并扩及由中亚延伸到印度、东南亚等辽阔地域。阿拉伯语是《古兰经》的语言，是所有穆斯林的宗教用语，也是阿拉伯地区居民的日常用语。

“伊斯兰艺术”泛指历史上伊斯兰统治区域内创作的艺术，包括宗教或非宗教的。伊斯兰艺术最主要的形式包括书法、彩绘手稿、书籍装帧、金属器物、陶瓷、玻璃、纺织品、绘画以及建筑。尽管清真寺中禁止出现具象描绘，但在非宗教功能的艺术品中仍可见动物与人物形象。

《古兰经》中的经文常常出现在宗教艺术和建筑中。伊斯兰教五功中的首项，即念作证词：“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常见于建筑物和日常器物上。礼拜毯是另一种重要的宗教艺术形式。由于行善是伊斯兰教的核心教导，虔诚的穆斯林会向清真寺捐赠礼拜毯和其他物品。

伊斯兰艺术品以书法、几何形状、花卉和植物为装饰纹样。这些纹样的设计和图案，往往受伊斯兰世界不同地区之间及其与域外的艺术交流所启发。伊斯兰艺术中一些经久不衰的设计，往往得益于皇家作坊雄厚资金、优秀人才和上乘材料的结合创作而成。

第二单元 萨法维王朝(1501-1736年)

萨法维王朝持续了235年,是伊朗近代历史上最伟大的朝代之一,巅峰时期其版图包括了现今伊朗以及伊拉克、阿塞拜疆、土耳其、阿富汗、格鲁吉亚等部分地区。阿拔斯一世(1587-1629年在位)为萨法维王朝功业最为显赫的统治者,他的强国方略除了军事战役、高效行政管理、城市发展计划、经济复兴战略,还包括与欧洲和印度的商贸联系。

在阿拔斯一世的统治下,国家资助的丝绸产业创造了巨额利润,为其军事行动、政治计划和基础设施提供资助,同时也赞助了位于伊朗中部的的新首都伊斯法罕的艺术发展。伊朗丝绸的吸引力来自其非凡光泽。阿拔斯一世为了对抗与之发生多次军事冲突的邻邦——鄂图曼王朝,在与欧洲的外交活动中,他经常透过交换丝绸和珍贵礼物来争取结盟。除了生丝之外,欧洲人亦渴望拥有萨法维的精美货品,尤其是最著名的地毯。

经纬用丝线编织的地毯价值极高,织工有时还会使用包金属的丝线来增强华丽的效果。16、17世纪,为了满足欧洲对萨法维地毯的需求,伊朗织工用各种方法来提高工作效率,包括以棉线替代丝线,来减少每平方单位的结数。虽然整体设计亦有所简化,但萨法维地毯仍然引人注目,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脱颖而出,与鄂图曼地毯的竞争力不相伯仲。阿拔斯一世投资国际贸易,也促使中国瓷器涌入市场,尤其是在1622年萨法维重新控制波斯湾之后。他还把数百名中国陶瓷工匠带到伊斯法罕,与当地同行分享知识,改进当地制陶工艺。奢华的中国瓷器刺激了经济,阿拔斯一世还以它们行善——他曾向阿尔达比勒的萨法维神殿捐赠了约一千件精美的中国瓷器。

第三单元 莫卧儿王朝(1526-1857年)

莫卧儿王朝国祚长达三个多世纪,统一了几乎整个印度次大陆。王朝创始人为巴布尔(1526-1530年在位),其母系血统可以追溯到成吉思汗。就父系而言,巴布尔是帖木儿的后裔。他的孙儿阿克巴(1556-1605年在位)扩张领土、推动行政改革,让莫卧儿王朝成为强国。在贾汉吉尔(1605-1627年在位)和沙贾汗(1628-1658年在位)的统治下,王朝发掘了世上最稀有的钻石,并建造了最精美的建筑,令举世惊叹不已。

莫卧儿地毯气派非凡,无论是品质、工艺、尺寸或成本,都足使其成为非凡的艺术品。在莫卧儿官方仪式上,地毯标志着荣誉席位。此外,皇家地毯亦有作为私人享乐空间的功能。阿克巴是当时极具影响力的艺术赞助者,大力支持绘画、地毯编织等艺术发展。莫卧儿全国各地的皇家作坊蓬勃发展,亦有赖于伊朗移民织工的参与。

莫卧儿最上等的绒毯会以丝线为经纬线,并以产自喜马拉雅山山羊的帕什米纳羊毛制作绒头。17、18世纪,英国、葡萄牙和荷兰商人将在拉合尔、阿格拉等地方制作的莫卧儿地毯出售给欧洲客户;荷兰人亦将地毯带到日本。莫卧儿王室往往以地毯为外交礼品,例如沙贾汗曾向鄂图曼新苏丹易卜拉欣(1640-1648年在位)赠送两张礼拜毯。

1636年,沙贾汗成功扩展势力,将南部德干高原纳入王朝版图。1680年代末,其子奥朗则布(1658-1707年在位)征服戈尔康达——当时全世界唯一可开采钻石之处。就在此时,一种独特的莫卧儿—德干绘画风格渐渐发展起来,并影响了地毯的设计。德干地区的多元文化,体现于宫廷不拘一格的视觉语言中,其灵感来源包括中国瓷器和丝绸。

第四单元 鄂图曼王朝(1299-1923年)

鄂图曼王朝(又译“奥斯曼王朝”)以其创始人奥斯曼(1299-1324年在位)命名,持续了六百多年,在鼎盛时期控制着世界史上最大的领土。15世纪,苏丹穆罕默德二世(1444-1446年、1451-1481年在位)统治期间,鄂图曼已成为泱泱大国,同时亦雄心勃勃,成功拿下君士坦丁堡,并且终结东罗马帝国。历代鄂图曼苏丹都身居伊斯坦堡的托普卡帕宫,第十任苏丹苏莱曼大帝(1520-1566年在位)则见证了王朝极盛之世。

鄂图曼宫廷的作坊为王室和高级官员制作了非凡艺术品,其中以纺织品,尤其是提花织物、缎和天鹅绒最为著名。伊斯坦堡的纺织协会为内销、出口和制作外交礼物提供布料。国际纺织品贸易利润丰厚,因此引发了鄂图曼和萨法维王朝间的多次战争。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时期,鄂图曼与伊朗的接触,都在鄂图曼的艺术品上留下了印记,例如安那托利亚西部地毯制造中心乌沙克的开光纹地毯。

地毯是鄂图曼纺织业的重要部分,一般用于装饰宫殿、清真寺和大宅。最精美的鄂图曼地毯是由皇家作坊制作,当中又以礼拜毯的品质为最上乘。皇家地毯通常由丝线和羊毛线混合制成,采用不对称的波斯结编织法,图案类似陶瓷和彩绘手稿上的装饰。从首都伊斯坦堡远至安那托利亚和高加索地区,工匠会用土耳其对称结来编织几何图案和抽象的动物图案。

鄂图曼艺术也呈现了中国艺术图案——如地毯和土耳其西北部烧制的伊兹尼克陶器。当中云纹、莲花和牡丹图案取自元明(1279-1644年)早期的瓷器与丝绸,深受鄂图曼上流社会喜爱。他们视中国瓷器为身份象征,在婚礼等重要场合中会用作餐具。中国的景德镇陶工会为鄂图曼人制作陶器,而这些陶器有时会由伊斯坦堡的皇家作坊加上嵌宝石的底座装饰。

大马士革厅

大马士革厅是多哈伊斯兰艺术博物馆的亮点之一。此处原为接待室，属于大马士革一个富家住宅，历史可追溯到1817年。博物馆用了四百多块木板和石制品，精心重建了这间房间。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以数码方式展示多哈伊斯兰艺术博物馆的大马士革厅。大马士革是现今叙利亚的首都，也是世界上最古老城市之一，带有古希腊、罗马、拜占庭和伊斯兰文明的印记。

伍麦叶王朝(661-750年)建立于先知穆罕默德(约570-632年)去世后第二十九年，以大马士革为首都，市中心的大清真寺是当今世上最大清真寺之一。大马士革是朝圣者前往麦加的出发点，骑骆驼大约需要四十天。

17世纪，大马士革已成为国际商业中心。富商的豪华住宅是社交活动、商业谈判和社区聚会的半公共空间。此接待室属于款客之处，客人可在此受到热情招待。

房间饰以的木质花卉和几何图案，是由金箔、锡箔、镜子和其他反光材料制成，因此房间的氛围会随着光影变化而改变。这些图案融合了鄂图曼、波斯、印度和欧洲元素，体现了大马士革的多元文化。

房间墙壁上以书法呈现的诗歌增添了雅致之情。其中一首诗的部分内容为：“莺语夜阑干，友声山外山。神之听之矣，福履卜君安。”